

# 政 治

## 我国现阶段的货币流通

秦亚男

### (一)

货币活动总是经济活动的一种反映，要了解现阶段我国货币流通的新局面，必须简略回顾一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政策的演变。

在1978年以前，我国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一种高度集中的、以行政管理为主而又忽视市场调节的体制。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对于克服长期战争所造成的混乱状态，进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对于有计划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统一调节全国经济活动，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实行的时间久了，却暴露了严重的弊病。这在生产上表现为以产定销，供需脱节；在流通上表现为统购包销，独家经营；在分配上表现为统收统支，统负盈亏，“吃大锅饭”。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加以对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处理失当，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很不合理，由国家财政集中和分配的收入过多，地方、部门的机动财力很少，归企业支配的收入更少，职工和农民的收入长时期不能随生产发展而相应增加。事实证明，传统的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束缚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不改革，就没有四个现代化。”改革，正是我国经济的出路和希望所在。

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正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根本转变，即一场从“左”的旧路子到一个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新路子的转变。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政策根本转变的基本特点大致有三个方面：首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具有中国的特色；其次，我国的国民经济必须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第三，确定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基本政策。

为了适应上述经济政策的根本转变，1981年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国家在制定计划时也要充分考虑和运用价值规律；对于带全局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要加强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对于不同企业的经济活动，要给予不同程度的决策权，同时扩大职工管理企业的民主权利；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做法，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结合起来，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经济法规来管理经济。”<sup>①</sup>

随着我国经济政策的根本转变和体制改革方向的基本确立，这几年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调整和改革了一些分配政策和分配制度，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鼓励了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的适当发展，增加了职工收入，调整了农副产品的价格，使国民收入分配

<sup>①</sup> 赵紫阳总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1981年11月30日。

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就出现了我国货币流通的新局面。

## (二)

我国货币流通的新局面，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政策根本转变的结果。它表现为如下的四个方面：

### 1. 货币投放大幅度增加，但增长速度在减慢

1979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实施，有许多新因素在促使着货币流通量迅速扩大，这些因素主要是：

(1) 由于推行社会主义责任制，经济活动的责、权、利适当下放，实现责、权、利三者相结合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由国家财政集中的收入份额逐年减少。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37.2%下降到1982年的25.5%。与此同时，归地方和企业支配的纯收入大幅度增加，地方和部门掌握的国家预算外资金也越来越多，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只占国家预算资金的10%，而到1982年已占50%。

(2) 由于奉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商品流通的规模扩大了，流通的渠道增多了。过去的商业活动主要依靠国营商业这个渠道，现已发展为国营商店、供销合作社、个体商贩等多种经商形式，另外，还有工厂自销、商店自行采购、农村专业户的购销、城乡集市贸易等等。因而货币在市场上的周转时间延长了，即市场对货币的要求量增加了。

(3) 由于国家有意识地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通过扩大城镇就业人数，增加职工工资，增发奖金和津贴，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和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等措施，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从1978年到1983年，平均每个农民的年纯收入，由134元增至309.8元，即增加1.3倍；职工平均年工资由614元增至826元，平均增加35%（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后增加15%），这些，也使得货币流通量大有增加。

由于上述因素，从1979年起，我国货币发行量开始有较大幅度的增加，1979年增发55.68亿元，比上年增长26.3%；1980年增发78.49亿元，比上年增长29.3%；1981年增发50.14亿元，比上年增长14.5%；1982年增发42.78亿元，比上年增长10.8%。四年共增发227.09亿元，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不难发现，货币发行量的较大增加，是适应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的需要，但随着调整的成功，货币量增长速度已趋减慢。

### 2. 货币总量的构成发生变化

过去，我国金融界倾向于把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局限于现金流通，而把以转帐结算形式出现的货币收支排除在货币流通范围之外。这是由于多年以来一直把属于国家计划调拨范围的生产资料排除在商品之外。1978年以后，市场调节作用逐步发挥，生产资料进入市场的品种也逐渐增多；经济往来中使用现金的范围和数量也不可能象过去那样严格控制，在这种变化了的情况下，若把货币流通量的计算仍限于现金一项，必然难以考察货币流通的真实面貌。经过这几年学术界的讨论，一般同意应该扩大货币流通量的计算范围，把可以通过转帐而用于购买商品的国营单位的存款或透支额度也算入货币流通量之内。因此，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有必要把我国货币总量构成分为  $M_1$ （现金）、 $M_2$ （国营单位的转帐存款和透支额度）和  $M_3$ （活期储蓄存款与定期蓄储存款）。显然，从长远看，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存

款货币使用的增加。但在现阶段,  $M_1$ 的增加速度快于 $M_2$ 。例如, 国家收购农副产品时所支付的贷款中, 现金所占比例, 在1978年为27.9%, 而在1982年为55.7%。再如, 基本建设投资额中, 现金支付部分在过去约占20%, 现在却超过了30%。因此, 从银行现金收支的情况看来, 在1979—1981年间, 每年现金的收与支分别为22%左右, 而在1978年以前只有6%。

### 3. 现金持有情况发生变化

在货币总量、特别是现金总量增加的同时, 群众手持现金的数量及其分布状况也有明显的变化。

首先, 城市与农村居民的手持现金普遍增加。由于体制改革使广大工人和农民的货币收入增加, 并使社会经济单位平均缩小(例如, 在农村, 经营单位已由过去的500多万个生产队变成17,000万个农户), 因此, 手持现金在金融资产中的比重增大了。1981年每个农业人口的手持现金量平均为30.03元, 比1978年增加94.5%, 城镇职工平均每人手持现金36.45元, 比1978年增加50.2%。农村的人口大大地多于城镇人口, 所以, 农村在全国持币量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 由1978年的59%增至1982年的64.2%。

其次, 城乡居民虽然普遍增加持币量, 但个人之间持币量的不平衡则是加大了。据黑龙江、湖北的调查, 大体上是20%的人口持有50%的货币。持有货币较多的, 在城镇主要是个体工商户、城镇饲养户、高工资收入者、计件工资收入者; 在农村主要是耕田能手、工匠、专业户、专业运输户, 等等。

### 4. 货币流通的规律发生变化 这又表现为多个方面:

(1) 货币的投放与回笼。以往货币的投放与回笼有明显的季节性, 一般是下半年的投放多于回笼, 因为这时是收获季节, 国家大量收购农副产品; 而在上半年则是回笼多于投放, 因为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动用他们上一年的收入去购买工业品。这个季节性的特点在1983年开始起了变化。1980年上半年回笼货币24.4亿元, 1981年同期回笼39.8亿元, 1982年同期回笼43.8亿元, 但1983年同期仅回笼17.1亿元, 这是因为1983年上半年基本建设投资 and 农业贷款增加过快, 同时工资性现金支出太多。其次, 回笼货币的地区构成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主要集中在京、津、沪三大城市, 1979年上半年这三市回笼货币占全国回笼总额的61%, 1980年同期减至44%, 1981年同期为34.6%, 1982年同期只占12%, 这说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各地区的物资供应充裕, 就地回笼货币的能力增强了。

(2) 货币的沉淀(储蓄)。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全国储蓄存款自1978年后持续、稳定地上升, 从1978年到1982年, 四年共增加464.8亿元, 比以往三十年的增加额多1.2倍, 储蓄占居民货币收入的比例, 由1978年的2.3%增至1981年的5.92%。而且储蓄存款的期限也发生了变化, 在城乡定期储蓄存款中, 三年以上的长期储蓄占50%左右, 而且很少提前动用, 说明储蓄越来越带有积累的性质, 并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随时会冲出来扰乱市场的“笼中虎”。

(3) 货币量所表现的社会购买力同市场上可供应商品量的比较。尽管这几年来生产有迅速的发展, 同时储蓄存款有大幅度的增加, 但由于投资规模过大, 居民货币收入增加过多, 另售商品货源与社会购买力的差距在缩小。1980年前者比后者多100亿元, 1981年这个差距便降为33.3亿元, 1982年又降至3.3亿元。虽然这些年来市场供应基本良好, 凭证购买的品种类已减至只有粮、油二种, 但通货膨胀压力隐约存在也是不能讳言的。

从上述我国货币流通的新格局可以看出, 经济体制和政策的改革, 既带来了极大的成

功，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 (三)

从1983年上半年的资料看来，当前我国货币流通存在着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资金不足与分散的问题。

资金不足，一向是我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难题，现在我国要在大约二十年里把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和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问题又突出起来了。据有些学者估计，要实现翻两番的任务，除了努力使我们的资金利用有更高的效率外，还需要增加资金投入量13,000亿元。这笔巨款，主要地当然要由我国人民从劳动中创造和从节约中积累（外资虽然可以利用，毕竟只能是一小部分），决不能走通货膨胀的道路。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现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差，积累能力小，其次是资金分散。近年来，由于权力下放和人民生活改善，地方、企业和个人的钱多了，而国家预算的钱少了。要避免赤字融资，只有花大气力把社会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这是银行的首要任务。

#### 2. 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和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的问题。

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在我国是个老问题，1979年以后虽有明显好转，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由于地方和部门掌握的国家预算外资金越来越多，1983年上半年，许多地区和部门又错误地理解了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的号召，纷纷地提出庞大的建设计划，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又比上年同期增加17%，远远超过国民收入增加的速度（6.3%），因基本建设投资过多而增加的货币量达30亿元。与此同时，农业贷款和工资性支出也增加过猛，前者在1983年上半年比上年同期增加49.3%，后者则增加11.5%，也都大大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几种开支的大量增加，部分地要由国家财政拨款来解决，这就形成了对财政和货币稳定的严重威胁。

#### 3. 企业资金运用上的经济效益不高问题。

长期以来，经济管理制度上的“吃大锅饭”、“棒铁饭碗”的毛病，使企业占用的资金量很难压缩，资金周转缓慢，资金浪费严重。现在国营企业占用的流动资金近4000亿元，工业企业的流动资金每周转一次需时110天左右，而在美国只要50天左右。这个对比，显示出我国企业在资金利用上有很大的浪费，也就是有很大的节约潜力。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全国国营工业企业的流动资金周转，如能加快一天，便可节约10.07亿元。

#### 4. 财政赤字与存在通货膨胀压力的问题。

这些年来，国家把预算收入的财源下放了许多给地方和企业，而支出方面则基本上仍是高度的集中，而且恰恰就在支出方面出现了上述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太大和消费基金增加过快，因此近年来国家财政上一直有赤字。虽然赤字为数不多，且在逐年下降（1979年有171亿元，1982年降为29亿元，1983年为43.46亿元），但总是一个问题，而财政既出现赤字，银行势必增加财政性发行，这就潜伏着通货膨胀的压力。前面已经指出，近几年来，货币发行量有所增加，零售商品可供量和社会购买力的差额在缩小，1983年上半年甚至出现零售货源少于社会购买力，动用了国家的商品库存。有的物价也出现动荡，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信号。

解决上述货币流通的问题当然需要从多方面下手。经济体制的改革本来就是多方面的，

只有各方面协调一致，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就流通领域本身来看，以下两方面的措施十分重要，一是发挥银行在筹集生产资金，促进国家重点建设和稳定货币等方面的作用。近几年来，我国银行体制正在进行相应的改革，并已取得成效。二是货币流通的新局面要求有新的、强有力的货币政策与之相适应，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重视的问题。

#### (四)

讲到我国的货币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坚持稳定货币的方针。但也产生过50年代初期、60年代初期以及1978年以来的货币流通量过多的情况。货币流通量过多的性质和原因，在不同的时期是不一样的，因而纠正的办法自然是有很大的差别。我国在对付这个问题上所经历的三个时期，也可以称做我国货币政策的三个阶段。

1949年至1950年是第一阶段。这时候，货币量过多是国民党旧政权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为了对付这个局面，我们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同时打击投机倒把、破坏金融市场的活动。结果在生产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条件下，我们只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结束了延续12年的通货膨胀。

1960年至1964年是第二阶段。这时候货币过多是由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犯了“左”的错误，使我国经济遭受严重挫折，生产受到破坏，农业产值连续三年下降，商品供应严重不足，出现了通货膨胀。对此，我们果断地采取了种种控制货币投放和压缩消费的措施，把过多的货币吸收回来。结果，不到三年，我们又恢复了货币稳定、生产发展的局面。

1978年到现在可以称为第三阶段。这个时期的货币过多，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生产受到破坏，加以粉碎“四人帮”后头二年继续犯了“左”的错误，急于求成，以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商品供应不足，社会上待业青年很多，货币流通状况恶化。对付这个局面，我们采取了灵活的、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即一方面控制货币的投放，另一方面又在花钱少、收益大、见效快的原则下适当地增加货币供应量，用发展商品生产，搞活经济，提高经济效益的办法来解决货币过多的问题。其结果，货币投放虽然有所增加，但国民经济在调整中持续增长，物价上涨始终受到控制，国际贸易和收支还有顺差。

上述三个阶段的经验，引起了我国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们对社会主义国家货币政策的更大兴趣。当前有三方面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 1. 货币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重要性。

过去，我国经济学家对货币和货币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重要性是认识不足的。很多人认为货币政策从属于财政政策。但是，1979年4月党中央的工作会议以后，商品生产和一定程度的市场调节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得到了承认，这样，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也就自明了。人们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所说的货币是生产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推动力。”<sup>①</sup>加以这几年来推行货币政策的成功，更确立了货币政策的重要地位。现在还有人在争论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孰主孰次。我们认为，财政政策的重要性自然不容低估，不过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节的重要手段，也是人所共知的。二者只能是互相配合运用，很难说孰主孰从。

<sup>①</sup> 《资本论》第2卷，第393页。

## 2. 货币政策的目标与态势标志

社会主义国家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什么？长期以来，在我国，人们认为那就是稳定货币，也就是说，要使货币流通量同商品流通量相适应，从而实现物价的稳定。但是，近年来，也有人认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宏观经济的综合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物价稳定只是一个约束条件。还有人认为，轻微的通货膨胀能刺激生产，因此它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货币政策的目标。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货币政策的目标问题，应该根据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来确定。这个规律规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在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从而决定了发展经济不应该有损于广大人民的物质利益，因此不能靠通货膨胀来刺激。何况通货膨胀一经发生，就有它的惯性，很难长期维持在“轻微”的水平上，所以不能离开货币稳定而仅以发展经济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但也不能反过来仅仅以货币稳定作为目标，因为在我国的许多物价是长期固定的，货币的稳定与否有时不是很快能察觉出来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发展经济和稳定货币两个方面，发展经济是稳定货币的目的，因而是货币政策的第一位目标；经济的发展又有赖于货币流通的稳定，所以后者也是不能缺少的。

货币流通是否利于既定目标的实现，这就是货币政策的态势标志问题。长期以来，在我国，人们是凭着经验把现金流通量与社会商品零售额之间的比例关系，作为货币流通的态势标志的。在历史上，当这个比例是1:8.5时，是货币流通最稳定，经济发展最健康的时期，因此人们就认定，应该以实际比率与这个1:8.5比例的背离程度来断定货币流通的松紧和货币政策的成败。这完全是一种狭隘的经验之谈，没有充分的理论根据。事实上，自1978年以后，由于商品流通的范围扩大，在商品交易中，使用现金的比例增高，居民的现金持有情况也在变化，因此，现金流通量与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例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例如，1979年为1:8，1980年为1:7.8，1981年为1:6.9，能说这是意味着货币流通一年比一年更不稳定吗？当然不能，1981年恰恰是建国以来商品货币市场景况最好的年份之一。传统的经验数据已经不能适应货币流通的新情况了。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们提出，货币流通的态势标志除上述的经验数据以外，还必须看物价动态和商品供求情况。这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但这个问题现在有待进一步探讨。

## 3. 货币政策的主管机构和实施手段。

过去，在高度集中而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体制下，我国货币政策基本上是由财政部门主管的，银行不过是财政部的出纳机关。同时，一些在国外普遍被采用的调节货币流通手段，信贷条件、结算方式、利息率、准备金比例、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等，在我国或是未受重视，或是根本没有。近三年来，经过广泛讨论，多数经济学家和银行家认为，有必要扩大银行在筹集和分配资金中的作用，也有必要成立专管货币发行和集中管理全国信贷资金的中央银行，并要发挥信贷、结算、利率等经济杠杆作用。这些意见已被采纳。今年一月已经成立了纯粹的中央银行。这也是意味着中国的货币流通将要进入到一个更新的阶段。